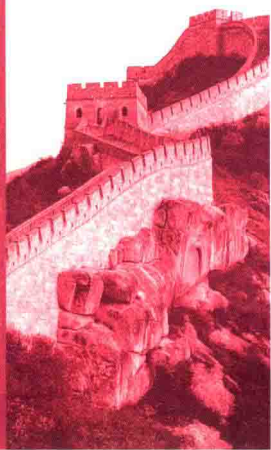


郑永年论中国



ZHONGGUO MINZU ZHUYI XINJIE

中国民族主义 新解

郑永年◎著 陈纳慧◎译

“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中国民族主义作何回应？

文明的冲突？儒家文明vs.基督教文明

新时代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将何去何从？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郑永年论中国

中国民族主义 新解

郑永年◎著 陈纳慧◎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 / 郑永年 著 .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207-1123-4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1994 号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

(ZHENG YONGNIAN LUN ZHONGGUO : ZHONGGUO MINZU ZHUYI XINJIE)

作 者：郑永年

译 者：陈纳慧

责任编辑：陈丽娜 李鹏飞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

邮 编：100028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15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1123-4

定 价：59.8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72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褚凤香和
缅怀我的父亲郑堂土（1911—1997）

译者序

郑永年老师的《中国民族主义新解》的英文原书出版于 1999 年。20 年过去了，中文读者终于可以通过阅读较为全面地了解郑老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真知灼见。

该书的翻译始于 2014 年我在新加坡攻读博士期间，而郑永年老师在萌生撰写此书的最初想法时，也正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翻译此书前，我有幸在新加坡多次受教于中年学者郑永年，而研读此书则是我跨越时空与同龄的青年学者郑永年对话。美国与新加坡、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两代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和亚洲的异域回望母国，这种回望在时代变迁中承续同一个主题，即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承续性是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反

映了《中国民族主义新解》在英文版问世 20 年后依然所具有的生命力。在此，我仅就自己在新加坡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于后辈学者的启迪意义略作论述。

郑永年在《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一书中指出，到了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一种不同于传统排外主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这一新民族主义通过界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来强调中国性。我认为，在理论层面，此点可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进一步思考：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由爱国主义转化为新时期的文明，意味着文明认同和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合流了。更确切地说，当民族主义站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时，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也就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民族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攻讦所要建立的是中华文明域的内部认同，而这一文明域的覆盖面显然远超中国。另一方面，与其说中国新民族主义将中华文明与中国民族主义合流，不如说是要以文明思维来补充民族主义思维，以超越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

思考国际关系的局限性。

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层面，中华文明渗入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人在看待海外华人时更加难以辨清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文明认同的严格界限，这也增加了中国国内对海外华人和他们的所在国认知的复杂性。以我研究中新关系所得的发现为例，通过将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强的新加坡囊括在中华文明的“大伞”下，中国倾向于对其采取一种以文明从属拉拢政治立场甚至赢得政治从属的外交策略。然而，在新加坡方面，对新加坡的政治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构成一种紧张关系。他们坚持要澄清两点。首先，中华文明不应占据新加坡文化空间的全部，它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共同形成新加坡的文化认同。政府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控制它在包括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文化拼盘的影响力比重，以使其恰到好处地服务于建构全体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让华族的文化认同摧毁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其次，新加坡的领导者再三强调要将中华文明与中国相区分。

新加坡所依从和依附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由此可见，以文明为认同基础来理解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这也为中国如何借中华文明复兴的契机，在影响和定义世界秩序上发挥有效作用提出新的思考点。事实上，撇开中华文明与民族主义的界分，单就考察新加坡的文明从属本身，新加坡文明属性的秤砣往往在西方一侧。新加坡的文化和文明从属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也说明，文明的影响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不停变化的涵盖面。决定某一文明影响力的固然有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但更重要的却是代表和代言此文明的国家实力。中西文明在新加坡这一角逐场的胜负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中美实力的比拼结果。新加坡会越来越倾向于从属于中华文明吗？新加坡人会越来越乐于接受、学习和实践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吗？如果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那么回答是肯定的。

在此译著出版之际，以上是我最想表达的观点。

最后，我要感谢为此书的翻译工作提供过协助的郑永年老师、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帮助寻找相

关资料的同学和朋友。翻译工作的主体完成于2015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哥大丰富的图书馆藏和高效的馆际互借等服务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一书所引用的中文文献，我都力图寻找到原始资料以最大程度地为中文读者展现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

陈纳慧

2019年5月于北京昌平

英文版序言

撰写一本有关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专著的最初念头，是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形成的。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中国应借鉴市场经济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视察南方谈话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国民众重拾民族自豪感，也助长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外界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他们从历史经验推测，中国也将如同其他曾经崛起中的大国那样，对既存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和威胁。但不少中国人却很难理解，为何西方无视中国相对落后的现状，如此执迷于中国的崛起。

在分析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时，应将中国国内的因素考虑在内。在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讨论了笔者有关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初步想法后，笔者意识到，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兴衰是何等重要。于是，笔者决定撰写此书以深入讨论这一话题。

为民族主义下定义

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浩繁文献中，笔者发现很难为民族主义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也没有哪个单独的定义可以涵纳民族主义的各个方面。具体到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关的研究亦是多层面的（Wang, 1996b）。无疑，要以一项研究来讲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各个层面，是很困难的。在此书中，笔者将重点放在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特性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知上。

顾名思义，民族主义与“民族”有关。民族同样是一个很难定义和解释的概念。一部分学者在阐释民族主义时，通常避免使用“民族”一词。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75 :6）指出：“在政治学词典中，民族是最令人困惑也是主观色彩最浓的概念之一。”

他更愿意使用“国家”一词。但国家与民族显然并不能等同，如林蔚（Arthur Waldron, 1985 :417）所言：“‘民族’拥有一些‘国家’所不具备的东西：那就是‘民族主义’所蕴含的无可比拟的情感、热情和合法权利。”这是因为，民族同时具备语言、宗教和共同的血统这样的客观特性，以及以民族意识和情感为代表的主观特性（Kellas, 1991 : 2）。

围绕着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民族主义的定义也千变万化，但它的主要内容还是清楚的。民族主义包含两个重要层面：机构和认同。首先，民族主义最终要通过机构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个体的民族主义情感或观念，在被组织起来之前是无足轻重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国家。如克劳福德·扬（Crawford Young, 1976 : 72）所言：“只有现代国家才能成功表达民族主义。”其次，民族主义事关归属感和认同感。民族认同不应与种族、族群、文化、语言、宗教等认同相混淆。民族认同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杨（Young, 1976 : 71）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关认同的意识

形态。通过将民族规定成归属感的终极指向，民族主义向民族赋予无上的精神权力。民族主义是一种深邃的政治学理论；它主动地为民族这一共同体承担义务，而非仅仅是被动地处于从属的位置。”在极端情况下，民族认同表现为“人民愿意为了他们的民族而牺牲生命”。（Kellas, 1991 : 3）

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欣斯利（F. H. Hinsley）提出，可以把民族主义理解为：

一种将政治归属感投向民族的观念。民族主义从无到有，并不是因为人们的政治归属感从无到有。政治归属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它之前投向其他形式的组织，如今转向了民族。变化的并不是政治归属感本身，而是它所归依的对象和表现它的对象（Hinsley, 1973 : 19）。

确实，是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民族认同。欣斯利指出：

国家的兴起将政治归属感的对象提升到国家层面。在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乃至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社会结构相对简单，都不足以产生国家运行所需的行政准则。在对外交往中，也不会有国家以这样的准则来要求它们（Hinsley, 1973: 28）。

此外，民族主义也包含了国际层面。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知有关，它涉及中国的主权、独立和与他国的关系。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它意味着“世界被分成或应该被分成各个民族，民族是主权国家的唯一合法基础，也是政府权威的根本来源”（Mayall, 1991: 2）。在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看来，主权的原则对民族国家意义重大。首先，只有主权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主权，才能使国际问题的解决具有合法性。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都是唯一的。主权国家间所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由各主权国自我监管或共同监管。第三，从人们狩猎、

农耕和去工厂做工的地方到他们实现政治生活最高目标的地方，主权原则都普遍适用。最后，主权原则是对他国国内事务的不干涉原则。否则，主权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国家作为民族的代表，将本民族与世界连接起来。在现代社会，只有民族国家才能使文化、种族、语言等民族主义的要素在国际体系中产生重要作用。

致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学者的特别指导。我非常感谢王赓武先生，他读了两遍我的手稿，并为我提供了有益的批评、坚定的鼓励以及他自己的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知识。同时也非常感谢 Peter Katzenstein，他对我形成从世界政治视角来观察民族主义的方法论观点提供了重要帮助；还有 Benjamin Schwartz，他鼓励我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非常感谢 Paul A. Cohen、Eric Heginbotham、黄亚生、刘晓源、Ido Oren、Robert Ross、Etel Solingen、吴国光、Ashutosh Varshney、王小冬和黄朝瀚的点评和建议。感谢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推荐人，他们给予了我有关国际政治方面建设性的意见。还要感谢黄山奇、邱泽奇、傅高义（Ezra Vogel）、

James L. Watson 和王志广所提供的经常性帮助。

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亚太研究丛书”的编辑 John Ravenhill 鼓励我把这本书稿提交给这套丛书。我还想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有益支持，尤其是 Phillipa McGuinness，从书稿的初审直到书的出版，她都参与其中。还有 Paul Watt 和 Edward Garuso，他们在手稿编辑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还要感谢 Russell Brooks 为本书准备了索引。

最后，我要感谢很多机构的支持，正因如此，本研究项目才可能顺利进行。非常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 / 麦克阿瑟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基金提供的研究经费。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傅高义先生领导下的费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为我（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知识环境，而王赓武先生领导下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在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的新加坡，为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学术场所。最后，非常感谢东亚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